

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纪念

纪念国博百年考古文集

主编 吕章申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华诞及考古部建制三十周年而发起的一部纪念性考古文集，作者多为考古部工作或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内容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水下、航空等方面考古业务的回顾、发展及未来展望，从石器到瓷器、从生业发展到祭祀文化等内容丰富的专题性考古学研究，以及文物保护和人类学研究等多领域研究成果。

本书适合国内外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人员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念国博百年考古文集 / 吕章申主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3-033898-3

I. ①纪… II. ①吕… III. ①考古学—文集 IV. ①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631 号

责任编辑: 雷 英 樊 鑫 陈 为

责任校对: 钟 洋 / 责任印制: 赵德静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 × 1194 1/16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6 1/4 插页: 18

字数: 606 000

定价: 2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传统（代序）

值此国家博物馆建馆百年之际，从200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恢复建制三十周年之时便开始着手编辑的这本学术论文集终于问世了，这是对百年国博一份珍贵的学术纪念。

博物馆与考古有着不解之缘。国家博物馆有着深厚的考古学传统。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传统可以上溯到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的初创时期。1912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是时以国子监为馆址）。在筹办展览之前，当时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已派员于1921年7月赴河北钜鹿（今邢台市巨鹿县）宋代故城进行调查与发掘，发现两处宋代古宅，获得“瓷陶杂器二百余件”，后“均陈列于馆内”（《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一册，1926年）。1924年春夏，又派员赴河南信阳汉墓进行调查、发掘，并在王坟湟坟发掘砖室墓一座，在擂鼓台发掘甲、乙两墓，墓葬被盗严重，仍得陶器、铜器、五铢钱等若干，“既竣事，运馆陈列”，并以“所获瓷器”，“详加考订，定为汉墓”（《信阳汉冢发掘记》，《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二册，1926年）。这批发掘出土的部分文物，也于1926年10月1日在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以端门至午门的原建筑为馆址）的展厅内陈列，正式对外开放，并发挥了博物馆对考古出土文物的展陈功能。

诚然，在中国考古学初创阶段，当时的发掘工作尚没有规范的方法，也未测绘平面图，而主要是以抢救文物为目的，属“土法上马”（俞伟超：《中国考古学的现实与理想——俞伟超先生访谈录》，《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我们也不能以后来的考古学方法和发掘技术苛求当时的工作。尽管如此，这两次发掘，尤其是钜鹿宋代故城的发掘，也明显带有学术研究之目的：“初冀寻觅该寺（三明寺）遗迹，藉考宋代庙宇之建筑，以资研究”，并对遗址的历史背景、形成原因、遗物性质与年代等均作了一定的考证，“虽未能尽洩其秘蕴，然在我国考古学发创之秋，能以数百年古物供都人士之鉴考，未始不为创举也”（《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此亦可谓国家博物馆考古工作之肇始也。

此后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历史博物馆几经改隶、更名，但均以陈列、保管和收藏文物为主，考古工作寥寥。自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历史博物馆主要忙于新中国文物的收集、保管和陈列，尚未设专门的考古机构，但也时常临时抽调馆内相关部门的业务人员，参与协助文化部文物局进行重点区域的文物考古调查，

或与地方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历史博物馆成立专门的考古部门成为当时形势所需。1956年，经文化部文物局批准，当时的历史博物馆组建考古部，并受到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的重视，由当时文物处处长陈滋德兼任考古部主任，佟柱臣先生任副主任。后至1959年，因“极左思潮”的影响，考古部被撤销。1960年，经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批准，迁至新馆后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成立了考古部，由李遇寅同志担任主任。当时部门的规模非常小，业务人员仅数人，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文化部文物局进行重点遗址的调查和文物保护工作，并协助各省文物部门培训文物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工作又陷于全面停顿。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全国的考古工作逐步恢复。1973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和保管部胡德平等人出访西德，受到当地一些小博物馆内都开展有考古业务工作的触动和影响，王冶秋局长遂提出，国家文物局系统应在历史博物馆内，建立一支像样的考古队伍，让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虑重新恢复考古部的建制问题。随后，中国历史博物馆积极回应，着手恢复考古部建制的各项准备工作。1975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经过当时保管部负责人李石英、胡德平二位同志努力，先在保管部内成立了一个文物考古征集组，由杨文和任组长，最初的成员只有我馆业务人员李锡经、陈斌、王晓田、于文荣、董琦等人。接着，又从外地调进一些业务人员，先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借调李作智同志来馆工作（至1978年初才正式调来馆内），接着又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调入有商周考古研究专长的李先登同志。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重建的具体工作由保管部主任李石英负责，并完成《关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恢复考古部建制的报告》，上报到国家文物局。1979年2月28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我馆，同意恢复考古部建制，并批准给考古部40人的编制名额。这样，考古部正式从保管部文物考古征集组分离出来，由李石英、胡德平二位同志任正、副主任，主持考古部的日常工作。由此，历史博物馆的考古学传统正式确立，并得以良好地延续。

考古部恢复建制之初，为开展日益繁重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学术研究工作，积极扩大和充实业务力量，在国家文物局和博物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考古部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陆续从各地调进一批业务骨干，如著名的文物专家孙机、陶瓷专家李知宴和郭仁等，是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等单位调进的。后又从山西调来张素琳、屈盛瑞，并从北大争取分配进张威、荣欣、许志勇、信立祥、佟伟华等毕业生。至1984年9月杜耀西同志接任考古部主任后，我馆于1985年5月从北大调来了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到考古部工作。根据田野考古工作的需要以及同志们的业务专长，当时考古部设立了商周秦汉与隋唐宋元两个研究小组，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工作，如登封王城岗与阳城遗址、龙泉东区上严儿村窑址、宁

夏菜园遗址、平朔秦汉墓、垣曲东关遗址和商城遗址等。可以说，自恢复建制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是我馆加强业务队伍建设并逐步进行大型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阶段。

自 1987 年俞伟超先生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之后，他继续加强考古部业务队伍建设，不仅又陆续从各高等院校分配进一批研究生和大学生，同时还派专业人员到国外进修学习新的考古学方法与技术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逐渐接触到了国际考古学界自 60 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称之为“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俞先生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对新生事物、新技术、新思潮十分关注和支持（俞伟超：《考古学思潮的变化》，《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1991 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组织编译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秦出版社，1991 年）即是这一敏锐思想的集中体现，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新考古学”理论与实践探讨的热潮，包括伊恩·霍德在 1985 年提出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考古学新的发展。

具体而言，在考古部的田野工作与研究中，俞先生逐步引入了这种新的学术思潮，并对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要有自己的特点，要走自己的道路，田野考古要学习国际上先进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古发掘和研究，探索古人类文化和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提出环境考古学，尤以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的多学科综合考古发掘和研究为代表。其后，信立祥、戴向明先后负责田野考古，基本延续了这一发展思路。步入新世纪以后，考古部又陆续开展了一批大型学术科研项目，如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汉代道教遗址群的大规模调查发掘、山西垣曲盆地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时期聚落形态与社会变迁的考古调查、山西运城盆地“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山西绛县周家庄龙山文化大型遗址的持续发掘，早期秦文化调查与发掘，陕西关中地区秦汉时期离宫别馆考古调查，山东“八主祠”调查、发掘与薛河流域考古、皖江东部先秦聚落考古调查等及相关综合性研究等，均是以主动性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大型考古项目。

在俞伟超先生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努力下，考古部还积极拓展考古学的研究视域，引入新的考古学科分支，并分别于 1987 年和 1994 年，组建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和航空摄影考古研究室，从而开辟了中国的水下考古学、航空考古学领域，填补了学科空白。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而改为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分别由张威、杨林负责，相继开展了多项调查工作。其中，水下考古工作有广东南海一号沉船遗址调查、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发掘、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福建平潭碗礁一号和大练岛一号沉船遗址发掘、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发掘以及全国沿海水下文物普查，不仅在实践中创立了中国水下考古学，而且逐渐开启了我国水下考古发展的新纪元。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方面，相继开展了对洛阳汉魏故城、祁山古墓群

和内蒙古赤峰古城址的航空考古调查，以及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研究工作中的应用、丝绸之路综合研究，等等。这些也是我馆最具特色的考古业务工作之一。

此外，以我国著名文物考古专家孙机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丰富的考古材料与文史知识，潜心学术研究，独辟蹊径，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如《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等，后增订再版，有着广泛影响，堪称中国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研究的经典之作。

2003年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为考古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吕章申馆长对考古工作十分重视，将其定位为国家博物馆的六项基本职能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发展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综合考古部，下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中心、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研究中心，继续发挥学科优势和特长，在全国各地开展陆地田野考古、水下考古、遥感与航空考古三位一体的全方位考古调查与发掘，并围绕考古学中的重大前沿课题，进行综合性考古学研究。今天，综合考古部已是国家博物馆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与业务部门，集中体现了我馆“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四项办馆方针。

三十余年来，考古部的全体业务人员，代代相承，一贯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一贯坚持战斗在田野（水下）考古工作的第一线，一贯恪守考古工作者的专业操守，学风端正，事业为先，已在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出版了数十部专著、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这本论文集，既是对考古部恢复建制以来的纪念，也是对我馆考古部业务工作大力支持的一份回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迎来百年庆典之际，我们相信，考古部的同志们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付出更大的努力，将这一考古学传统延续、发扬下去，把握学术前沿，不断拓展新领域，并取得更为丰硕的科研成果。



2012年3月

目 录

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传统（代序）	张 威 (i)
考古部的记忆	张素琳 (1)
国家博物馆晋南考古三十年回顾	戴向明 (9)
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学研究机构诞生	杜耀西 (19)
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与重要发现	赵嘉斌 (22)
中国航空摄影考古回顾与展望	姚乐音 杨 林 (29)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奠基者——贾兰坡	甄秀鸣 (34)
20 世纪夏文化探索	王力之 (39)
略论中国考古学与中国文物学之关系——以青铜器学为例	李先登 (50)
科技考古概述	杨 林 (52)
北方史前祭祀文化	王月前 (62)
宁夏史前文化考古调查纪实	陈 斌 李进增 耿志强 (96)
菜园遗存初步研究收获	李 滨 陈 斌 (128)
班村遗址古代文化与环境变迁	王建新 张广如 张居中 (133)
薛家岗文化石器工业研究	庄丽娜 (141)
四析王城岗城堡遗址	董 琦 (186)
垣曲盆地二里头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佟伟华 (194)
浊漳河上游地区蛋形瓮浅谈	李 嵘 (207)
凤雏刻辞甲骨的考古学观察	田 伟 (211)
论甘肃东部秦文化的年代	梁 云 (220)
咸阳塬新确认秦陵补证	游富祥 (234)
出土巴蜀印章研究	洪 梅 (243)
汉代墓地祠堂画像与墓室画像关系考	信立祥 (262)
周汉时期的“八主”祭祀及其历史影响	王 睿 (283)
山东青州市汉墓出土的空心砖制作工艺	李文杰 (295)
长沙窑彩釉装饰工艺及产品外销路线的研究	于文荣 (299)

试析闽南地区宋至清代窑炉形制及其演变	孟原召 (304)
论邢窑的分期与年代	牛健哲 (322)
试论《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体系	雷生霖 (344)
都城·所城——从元大都城及乍浦城遗址变迁看城市发展与文物古迹保护之关系	李 刚 (348)
三峡文物保护成果研究	郝国胜 (369)
人与土地——拉富什三角洲的变迁与史前遗迹	
..... R·A·温斯坦 S·M·加格利阿诺著 许志勇译	(379)

考古部的记忆

张素琳

我是1981年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历博”）考古部的，至今已在考古部工作了近30年。我来时考古部刚恢复建制两年多，因此我也亲眼见证了考古部成长、发展和不断壮大的历程。考古部不但从开始的十几个人逐渐扩大到现在的20多人，而且还由最初单一的田野考古组细分为专业分工更加明确的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三个研究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古部至今都是我馆平均学历最高、具有高级职称人数比例最高的部门，学术成果也在馆里名列前茅。为此，我作为考古部的一员，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我在考古部工作多年，而且担任过考古部的秘书，还在考古部党支部长期工作，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不但学到不少东西，也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2009年，考古部迈入而立之年，我不禁想起在考古部的近30个春夏秋冬，回首往事恍如昨日，一桩桩、一件件，都浮现在眼前，令人感慨不已（彩版一~彩版六）。

在考古部工作期间，对我而言最难忘的当属山西垣曲工地。记得我刚刚从山西调到历博考古部时，李石英主任就在与我的谈话中明确告诉我，我未来的工作地点仍在山西。我到考古部后，只在一个工地参加过发掘及资料整理，即山西垣曲考古工地。垣曲的东关遗址和南关商城遗址，是我一生从事考古工作时间最长、最难忘怀的地方。记得到考古部的第二年，即1982年4月初，我就在组长郭仁的带领下，与刚刚分配到部里的大学生张威三人，为配合探索夏文化，一起到山西考古调查，并选择合适的发掘地点。其实我们原计划是要到晋东南地区进行调查，没想到在太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联系工作时，遇到垣曲文化馆的原馆长吕辑书先生。郭仁与他在招待所同住一屋，听他热情而详细地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后，觉得垣曲这个地点非常重要，不但各时期的遗址数量众多，而且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对学术研究和探讨非常有益。于是我们改变了计划，随吕辑书先生翻越中条山，首次来到垣曲。垣曲县位于黄河北岸的一个小盆地内，历史非常悠久，但相对封闭。20世纪80年代初的垣曲交通非常不便，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但是公交车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每天只在垣曲县城与古城镇之间早、晚各对发一趟车，所以我们的调查主要靠徒步进行。当时我们住在垣曲县招待所，环境脏乱差，条件非常简陋。每天早饭后由吕馆长引路，我们4人手持

小镐头、小手铲和陶片袋，沿着流经垣曲全境最大的河流——亳清河和沇河，先近后远地开始考古调查、勘察。路上经常是渴了喝一口随身带的军用壶里的水，饿了吃一块干饼子就咸菜。记得那年的5月份，垣曲的天气显得格外酷热，我们经常要顶着烈日爬坡、下沟查看地形、寻找灰坑等遗迹，采集陶片等遗物。因为4人中张威最年轻，所以背陶片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他肩上。就这样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先后调查了杨家河、坡底、后湾、口头、龙王崖、上亳城、下亳城、小赵、古城东关、南堡头和北堡头这11处遗址。每天下午回到招待所，我和张威便抓紧时间刷洗陶片，及时做记录，填写小标签，然后大家一起给陶片分类、划归时代。这段调查的日子既紧张，又因每天都有新的收获而让人高兴。我记得那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就是在垣曲古城遗址的调查中度过的。当时我们围绕古城东关的断崖调查，在剖面上发现了许多灰坑，而且有的规模很大，采集的史前陶片也特别多，大家都特别兴奋。最后将所有的调查资料仔细分析对比，并把采集的陶片分类整理后，大家一致认为古城东关遗址各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丰富，最适于发掘。在得到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的同意、支持后，决定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垣曲县文化馆合作，于1982年秋季开始在东关遗址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试掘。当时工地的领队是郭仁，考古部的张威、易苏昊和我以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海金乐参加了试掘。试掘取得很大的收获，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从此拉开考古部20余年在垣曲大规模发掘的序幕。从1983年起，考古队每年春、秋两季在垣曲工地持续发掘。2000年以后东关遗址和南关商城遗址逐渐被新建的小浪底水库淹没。为了掌握更多、更全面的资料，搞清楚垣曲商城的布局 and 整体面貌，考古队抓住每次水库水位下降的时机，对商城多次进行抢救性发掘。尤其是2003年春季，正值“非典”在全国肆虐，山西也是重灾区之一。4月初，工地领队佟伟华连同王月前、洪梅和我共4人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工地，对商城进行了最后一次发掘，直到5月底才回到北京。我们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收获颇丰。东关遗址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商城揭露面积13700平方米以上，而且研究结果证明，无论是东关遗址，还是商城遗址，对学术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82年以后，我每年去垣曲工地参加发掘或整理资料1~2次，至今已去过50余次，作为考古部到垣曲工作的首批人员，我与垣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在垣曲的考古工作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当时买火车卧铺票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每次出差前几天必须在早上6点前到西直门火车站排队买票，即使这样也经常买不到卧铺票，所以我们那时基本上都是坐硬座往返于北京和工地之间。为了不耽误工地的发掘，有两个季度我还把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带到工地去。当时无论是吃住，还是发掘，各方面的条件确实很差，但我们经常在苦中找乐。比如在没有建正式的工作站以前，我们曾在古城文化中心住过几年。那时晚上经常停电，我们就在院子里放声高歌，有独唱，也有二重唱，还有说书、讲故事的，连平时不苟言笑的郭仁也参加进来，大家自娱自乐，非常高兴。有时候吃过晚饭趁着天还没有黑，大家就一起到工

作站南边的毫清河边散步。在跨河的小桥上，我们坐在一个个水泥桥墩上，看着潺潺的河水川流不息地向东流去，听着河水欢快奔流的声音，畅所欲言，谈笑风生。后来，我们把每次到这里的散步和聊天戏称为“毫清河会议”。记得1984年秋季在东关遗址发掘时，正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国庆节。那天工地放假一天，大家围在14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前观看国庆大阅兵的实况转播。虽然因为电视的接收信号不好，画面上总似无数雪花在飘，一闪一闪地很晃眼，声音效果也很差，充满杂音，忽高忽低的，但是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坚持观看，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兴奋和自豪。当天我和参加本季发掘的郭仁、佟伟华、张威、安家瑗、孙其刚都亲自下厨房，每人动手做一个自认为还拿得出手的菜一块聚餐，在垣曲度过了一个特别难忘的国庆节。

垣曲新工作站的建设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此我和其他同志也付出了不少精力和辛苦。小浪底水库工程上马后，我们原来的工作站也在淹没之列，所以建新的工作站就成了那时最让我们着急、上心的事情。为了要到一块建站的地皮和建设费，从1997年开始，我和工地负责人佟伟华就隔三差五地到垣曲县移民办或古城镇移民办找有关负责人商谈。尤其是1999年，已经到了水库完工即将蓄水的关键时刻，老古城镇政府和其他机关早已搬迁，绝大多数居民在新古城镇的楼房也盖起来了，而我们的新工作站还没有着落，当时真是心急如焚。有一段时间我俩几乎天天去县移民办，而且在他们还没有上班之前就到了，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我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想尽了办法，磨破了嘴皮，费尽了周折，县移民办终于给我们批下来一块地皮，并把建新工作站的经费拨到我馆的账上。地皮和经费到手后，要在一片三层梯田式的麦子地里建起一座工作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谁也没有搞过工程建设项目，对此可谓一无所知。建站的过程更是充满曲折和变数，包括要找个合适并且可靠的施工队，工作站的整体布局和设计要合理，既要考虑保证工程的质量，又要合理使用有限的经费，必须详细计算工程用料的成本，总之是困难重重。最终由佟伟华出面，我和其他同志密切配合，与相关人员进行多次协商和谈判，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新工作站终于在1999年初冬时节破土动工。我们刚刚松了一口气，新的问题又来了：2000年6月初我们从工地才回北京不久，就从垣曲传来可靠消息，小浪底水库开始蓄水，水位急剧上升，很快就会将整个老古城镇淹没。我们在老古城的工作站地势本来就很低，一旦水上来，肯定是首当其冲，工作站的搬迁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此时新工作站虽然主体建筑已完工，但是内部装修还未全部完成。但是为了文物的安全，也为了与飞速上涨的水位争时间，抢速度，佟伟华当机立断，垣曲考古队全体人员于6月底紧急奔赴垣曲。到了老古城镇的工作站后，立即开会商量搬家的具体注意事项，拟定详细的搬家方案。7月1日是党的生日，也是我们最为紧张的一天。那天我们按照各自的分工，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收拾个人和公用物品，另一方面将库房里的数百件复原陶器标本装在垫有麦秸的竹篓里，把陶器残标本按单位装到筛子里，小件则全部装盒并用绳子捆好。最脏、最苦的活儿要数把多

年发掘、堆积如山的陶片袋从库房全部搬出来。长年未动过的陶片袋一经翻动，顿时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上气。另外，袋子如有破损要马上换上新袋，而且要按发掘年度分别堆放在大门附近，便于第二天装车搬运。7月2~4日，佟伟华、王月前和张帆在原工作站，我和戴向明在新工作站各就各位，搬迁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当时我们雇用了两辆卡车，召集了20多个民工装卸文物。为保证文物在运输途中的安全，每趟车都有我们的技工随同押运。搬迁工作每天早上6点前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多收工，终于在4日下午全部完成。当把文物集中放置在已采取安全措施的房间后，大家忘记了几天的紧张和疲惫，一颗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我感谢考古部，也感谢垣曲工地，因为是她们培养了我，锻炼了我。我在业务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获取高级职称，都与考古部、与在垣曲的工作密不可分。垣曲不但令我们这些长期在此工作的人难以忘怀，也让考古部许多来过这里的同志很难忘。尤其是部里每年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几乎都曾在垣曲工地发掘、工作过。1982年以来，考古部先后有郭仁、张威、张素琳、易苏昊、佟伟华、许志勇、张延平、魏江、陈斌、李滨、徐海滨、沈勇、袁虹、曹兵武、王睿、许兵、董琦、戴向明、王月前、张帆、洪梅和庄丽娜等同志参加了垣曲遗址的发掘、资料整理或者拍摄、绘图等工作。另外李文杰同志在这里短期工作过，李先登、张广如和李刚也到过垣曲工地或者工作站参观。粗略统计，考古部竟有20多人在垣曲工地工作过，这里差不多成了考古部的一个业务培训基地。由于垣曲工地是由我馆主持发掘的第一个考古工地，所以受到各级领导，尤其是考古部领导的重视。我记得有好多领导都来过我们工地：1983年秋季，部门领导胡德平和秘书齐虹到垣曲古城工地视察；1984~1985年考古部主任杜耀西两次亲临垣曲调研、指导工作，看望考古人员；1990年秋季俞伟超馆长到垣曲商城考察工作，并祝贺老古城的考古工作站建成；1999年春季馆党委书记谷长江、副馆长孔祥星和考古部主任信立祥等一起到垣曲视察工地，看望大家；2004年春季朱凤瀚和信立祥等同志到商城遗址实地考察，在新工作站参观文物库房，并与我们一起参加考古调查和座谈，指导工作。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

另外让我记忆较深的事情是考古部的多次搬家，其中的两次搬家经历尤为深刻。一次是1985年6月，我们部门要从馆东边的平房搬到端门的西朝房。当时没有搬家公司，也没有汽车，我们搬家全靠借来的几辆三轮车，男同志在前面蹬车，女同志在后面推车，就好像蚂蚁搬家似的把办公用具、书籍和其他家当一趟一趟地运送到端门。5~8日，我们用了4天的时间，往返无数次，才终于把原办公室的东西全部搬过来了。现在回想起这次完全靠人工搬家的过程真是不容易，幸亏当时各办公室的大型办公家具很少，也没有电脑等电器，搬运工作相对还容易一些。而与之相比的另外一次搬家困难则要大得多。这次是在1995年的12月，馆里又决定让考古部从端门西朝房搬回馆里办公。此时考古部在端门办公已10年有余，不但资料室已先后添置了许多金属书架和厚重的铁皮柜，还新增了复印机、体积很大的缩放投影仪以及大量的图书、报刊资

料。另外，我们每人也都配备了一个很大很重的实木文件柜和卡片柜，办公室也新购一部分铁皮保险柜等，而且有的办公室已添置了电脑等设备。为了安全、顺利地搬回馆里，我和部副主任佟伟华多次往返馆里和端门，带着皮尺仔细丈量新办公室和库房的面积，提前安排好各个办公室的人员和办公家具的位置，做到心中有数。为了这次搬家，我们在各方面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例如资料室的大量书籍资料，凭甄秀鸣一个人是很难在短期内收拾好的。佟伟华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布置搬家任务时，除了让每个人尽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之外，还要求大家分工对资料室的书籍、报刊打包。因任务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分工明确，所以资料室很快完成了搬家的准备工作。另外，我们还提前准备好搬家所需的大捆尼龙绳、大胶带纸等用品，方便大家捆书和包装其他物品。万事俱备后，我们与搬家公司联系，定好大卡车和时间。由于事先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细致，所以到了18日正式搬家那天，大家都早早来到端门，各就各位，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整个搬家过程忙而不乱，有条不紊。三辆大卡车往返拉了15趟，到晚上8点左右结束，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全部搬完了。这几次搬家，充分体现了考古部全体人员听从指挥、团结协作的可贵精神。

说到考古部，还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1997年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由我馆承办、考古部牵头，并与全馆各部门同心协力，成功地举办了大型展览——“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及围绕精品展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考古部从来没有办过展览，为了办好这次展览，考古部绝大多数同志都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筹办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内，以考古部人员为主体，我们充分调动全馆的力量，克服了重重困难，陆续从全国各地借调来大批最新发掘出土的考古精品。展览充分反映了我国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展厅新颖大气的布局，整齐划一的绿色文物柜，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展品，吸引了无数观众驻足凝视，流连忘返。在整个接送文物和办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既保证了各地借调文物的安全，又做到临时借来的全部资料完整无缺，在展览结束后做到了完璧归赵。另外，在举办展览期间，还由考古部主持召开了有关精品展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同时配合展览及时出版了精美的图录。这个凝聚了考古部全体人员心血和汗水的展览最终获得成功，不但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也赢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赞誉和好评。后来“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还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1997年优秀文物展览特别奖”。这件事办得圆满、漂亮，充分显示了考古部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很高的工作效率，令全馆上下对考古部刮目相看，考古部每个参展同志也为此感到自豪。

在考古部，你能感觉到很浓的学术氛围，每人都有具体的课题或者研究方向。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中，每个人都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因为你若不勤奋学习、若不加倍努力，你就会落后，就会无成果。考古部在国家博物馆是个资历最浅的部门，而且在博物馆机构改革中曾几次差点被取消或与其他部门合并。但是考古部30年来取得的不俗业绩证明，考古部在博物馆的存在不但很有必要，而且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经过考古部全体人员的努力，业务成果非常显著：在职与离退休人员不过30余人，却已

经出版几十部专著和发表近千篇学术论文，其中一部分著作和论文还获得过各种奖项。考古部人员绝大多数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目前在职人员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几乎占了一半，而已获高级职称的人数更是占了全部门的半数以上。由于考古部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都属于国内最早组建的前沿性机构，因此考古部成为我馆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和窗口，从而也提升了我馆在全国的知名度，扩大了我馆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另外，考古部人数虽不算多，却是我馆输送馆领导最多的部门：胡德平、俞伟超、杜耀西、王晓田、董琦和张威原来都曾是考古部的一员，他们先后都走上了馆领导岗位。从这一点来说，考古部为我馆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考古部人员互相帮助的感人事迹也不少，我相信考古部成员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感受到考古部这个集体带来的温暖。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搬家公司还没有出现之前，考古部几乎所有的同志都次数不等地参加过帮其他同事搬家的活儿，有的甚至参加了7次以上。个人搬家的困难也不少，因为当时要搬去的楼层绝大多数无电梯，而多数人所在的楼层还比较高。考古部人员的业务书籍和各类资料本来就多，再加上过去各家都有件数不等、很沉重的实木家具、大大小小的花盆等，搬动起来非常艰难。每次搬家大家都是汗流浹背、筋疲力尽的，但是无怨无悔。1991年1月，考古部在资料室专门为王睿、张广如、曹兵武和许兵四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除王睿的爱人有事未参加外，其余3位同志的爱人都来部里参加不寻常的婚礼。婚礼由部门负责人佟伟华主持，她代表全部门对四对新人祝词，衷心祝愿他们生活美满，白头偕老。几对新人 and 参加婚礼的人员都表演了形式多样的节目，有独唱，有诗朗诵，还有笑话，这场婚礼自始至终充满欢歌笑语。部门同事还凑钱为新人们购买了茶具和花篮等礼物，送上一份份美好的祝福。相信这次独特的婚礼，会令这四位同志和他们的配偶记忆犹新、深切感受到考古部全体同志的丝丝温暖。1992年初，在郭仁同志病重期间，考古部所有的同志都分批去他家看望，年轻的同志排班轮流陪同他到医院看病。在医院治疗时，郭仁因腿疼不能走路，更无法自己上楼梯，陪同他的男同志就毫不犹豫地背他上楼。身患重病的郭仁和家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考古部给予他们一家的关怀和温暖。还有多年前，一位同志的母亲不幸身患重病，而这位同志正在外地出差。在考古部委员会和党支部的倡导下，考古部全体人员踊跃为其母捐款，人人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连其他部门的一些同志闻讯后也加入到捐款的行列中。当考古部主任信立祥、副主任佟伟华和时任党支部书记的我带着数千元捐款登门看望病人、慰问家属时，他们感动得直掉眼泪。虽然大家的捐款数目远不够病人治病所需的费用，但是这件事也确实体现了考古部“一人有难，大家帮忙”的互帮、互助精神。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难忘，就是每年春节前，部门领导都要分头登门看望、慰问那些行动不便的离退休人员。对已经去世的李锡经和郭仁，我们曾坚持很长时间到家看望他们的家属。一直到两位老同志去世10年以上，我们自己都快退休了才结束探望。

而对考古部恢复建制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李石英老主任，虽然他经常搬家，我们却是无论他住到哪里，都没有间断对他的探望和慰问。记得其中有几次，因为部门其他领导不在京或有其他事情，于是春节慰问的工作就由我和佟伟华两人完成。比如1996年春节前，我俩2月13日上午到故宫给郭仁家属送慰问品，第二天上午就去李石英主任家看望，下午又接着去李锡经家慰问。当时部里没有汽车，春节前我和佟伟华多是各自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发，先到崇文门菜市场或别的商场买上水果等慰问品，然后再去各家慰问老同志。即使天气不好，顶风冒雪，我们也照去不误。值得一提的是，李锡经同志在佟伟华分配到考古部工作之前就已去世，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但是作为部门领导，佟伟华照样前去他家慰问，令其家属深受感动。部门领导不辞辛苦，一年又一年、一家又一家地登门拜访，带去考古部全体同志对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亲切慰问。

1990年12月，在端门资料室召开纪念考古部恢复建制10周年座谈会和迎新会，除了考古部全体人员，已经调走的胡德平同志同馆长俞伟超、党委书记吴代峰、副馆长杜耀西和老主任李石英均来参加，表示祝贺。佟伟华汇报了考古部10年来的工作情况，馆领导也都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们都肯定了考古部同志10年来作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当时的纪念品是一个以红色织锦为封皮的名片夹，每个名片夹里都有张威用略粗的黑笔写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十周年纪念”字样的一张卡片。这个纪念品虽然并不华贵，但是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保留至今。

2001年1月，在馆“职工之家”召开纪念考古部恢复建制20周年座谈会。这次的规模比较大，参加会议的除了考古部在职、离退休人员和曾经在考古部工作过的同志外，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文保司司长杨志军，考古处负责人关强以及本馆馆长朱凤瀚，党委书记谷长江，副馆长李季、王晓田，原馆长俞伟超、杜耀西，原主任李石英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也都参加了。座谈会由佟伟华主持，信立祥向大家介绍了考古部20年来的工作进展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来宾和诸位领导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张柏副局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考古部在历史博物馆中的重要地位，给全体同志很大的鼓舞。这次座谈会近50人欢聚一堂，新老同志互相交流，共同回顾考古部20年来走过的历程。座谈会开得有声有色，非常成功。为配合这次纪念活动，由考古部主编、科学出版社于2000年正式出版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书名是前馆长俞伟超先生提议的，纪念文集得到在职和曾经在考古部工作过的同志的大力支持，大家踊跃投稿，连朱凤瀚馆长也为我们的纪念文集送来一篇论文。纪念文集汇集了考古部成员在各自岗位上的研究成果，是考古部一次精彩的集体业务汇报。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喜庆之年，也是考古部恢复建制30周年的日子，可喜可贺。在考古部走过风风雨雨的30年之际，不由得想起曾经为考古部恢

复建制作出巨大贡献的胡德平、李石英、齐虹等同志以及曾为考古部发展、壮大奋斗过的所有同志，心里充满感动。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中我也正式退休了，加入考古部退休老同志的行列。我自认为我们这一拨人为考古部的发展和建设已尽全力，做到了问心无愧。虽然我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陆续来到考古部工作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考古部后继有人。他们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年轻有为，前途无量。衷心地希望年轻同志们继续发扬考古部的优良传统，再接再厉，为考古部、同时也为国家博物馆的未来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写于2010年8月

附录：恢复建制后的考古部人员名单（1979～2011）

离退休人员：李锡经 郭 仁 李石英 李先登 李作智 孙 机
李知宴 李文杰 信立祥 佟伟华 张素琳 许志勇 12 人

调到外部门：胡德平 俞伟超 杜耀西 易苏昊 屈盛瑞 荣 欣
王晓田 董 琦 张延平 齐 虹 魏 江 于文荣
曹兵武 刘本安 沈 勇 袁 虹 许 兵 苏元海
张 帆 徐为群 张 威 王月前 孙 键 曹大志 24 人

在职人员：杨 林 戴向明 赵嘉斌 陈 斌 张广如 甄秀鸣
王 睿 洪 梅 王力之 梁 云 游富祥 庄丽娜
徐海滨 李 滨 鄂 杰 雷生霖 姚乐音 李 刚
李 嵘 孟原召 魏延华 郝国胜 田 伟 王亦晨
王 霁 牛健哲 郭梦涵 张晓磊 邓启江 29 人

共计 65 人